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中国小说戏曲史

〔日〕狩野直喜 著
张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中国小说戏曲史

[日] 狩野直喜 著
张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戏曲史/[日]狩野直喜著;张真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0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21243-6

I. ①中… II. ①狩… ②张…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史-中国②古代戏曲-戏曲史-中国 IV. ①I207.409
②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4526 号

书 名 中国小说戏曲史

著 者 [日]狩野直喜

译 者 张 真

责 任 编 辑 卞清波 王宇平

装 帧 设 计 陈 婕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 插页 4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243-6

定 价 4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狩野直喜 (Kano Naoki, 1868—1947)

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中国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1906年起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10年起开设“中国戏曲及小说”课程，由此成为日本第一位以讲座教授身份在帝国大学讲授中国俗文学的学者。1919年至1922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1929年起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执掌京都帝国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讲座20余年。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王保顶

项目执行 卞清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译者的话

20 世纪 30 年代,陈垣(1880—1971)曾对胡适(1891—1962)感叹道:“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 还在巴黎?”^①早在 1923 年,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一次聚会上,陈垣曾表达过类似的感慨:“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西京如何……”^②这里所说的“日本西京”即京都,具体说就是指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京都帝国大学始建于 1897 年,其文科大学更是到了 1906 年方告成立,比始建于 1877 年的东京帝国大学晚了二三十年,何以能在短短十数年间就成为与巴黎并称的世界两大汉学中心?

东京学派^③是日本汉学界的重镇,其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东京学派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在其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

① 胡适 1931 年 9 月 14 日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 6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52 页。

② 郑天挺:《五十自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28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8 页。

③ “东京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东京学派”,指活跃于东京地区、从事中国俗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及其师承谱系,从学术史的事实来看,主要是指早稻田大学系(曾在早大任教、就学者,通称“稻门系”)和东京帝国大学系(曾在东大任教、就学者,通称“赤门系”);狭义的“东京学派”,则专指“赤门系”。本文主要指狭义的东京学派。

与一个强大对手的竞争，一部东京学派发展史也就是其与这个强大对手的竞争史，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在日本汉学史上与东京学派东西并峙的两鼎之一——京都学派^①。回顾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日本汉学史，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日本汉学的研究格局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东京、京都两鼎执牛耳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那么，这个强大的对手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

一、何谓“京都学派”

与“东京学派”相比，“京都学派”是一个更为多元而复杂的概念。“京都学派”一词，在中国学界比“东京学派”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尤其在文史研究领域，这几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其之所以在该领域广为人知，反过来也正好说明了学界对该词的理解也限于文史研究领域。这与事实有不小的出入，因此，有必要对“京都学派”进行正名。

“京都学派”最初并非是指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者，而是指由该校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1870—1945)、田边元(1885—1962)及与他们有师承关系的哲学研究者形成的哲学学派，其主要宗旨是促进西洋哲学与东洋思想的融合。在西田几多郎等哲学的京都学派影响下，京都帝国大学不同领域的学派纷纷出现。这些学派大多以京都帝国大学初创时期某一领域的研究者为中心、以他们的弟子为主要成员形成，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近代经济学学派、宪法学学派、精神医学学派等，他们都被外界同领域称为“京都学派”。而我们所熟悉的“京都学派”就是这众多学派中的一派，应称之为“东洋学京都学派”。

“东洋学”也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概念，可以从《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中看到其学科体系和代表学者的组成结构。该书表彰了京大东洋

^① “东西两鼎”的用法，主要借用了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严绍璦《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两书中的用法，前者将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总称为日本汉学界的“东西两鼎”，而后者则仅将盐谷温和狩野直喜称为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西两鼎”。本文则取两者之间的概念，即两大学中中国俗文学研究者的总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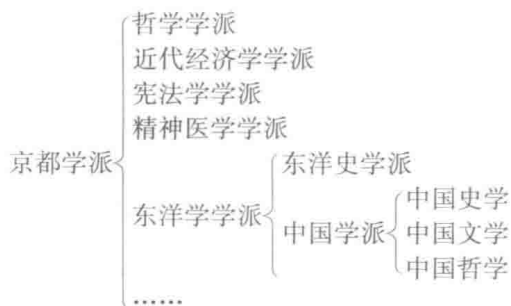
学百年史上的 11 位主要学者,这些学者可以按照年辈和主持讲座的先后分为三个时期^①:

时期	主要学者	学科领域
明治后期	狩野直喜(1868—1947)	中国语学中国文学
	内藤湖南(1866—1934)	东洋史学
	桑原鹭藏(1871—1932)	东洋史学
	内田银藏(1872—1919)	日本史学
	三浦周行(1871—1931)	日本史学
大正至昭和初期	铃木虎雄(1878—1963)	中国文学
	滨田耕作(1881—1938)	考古学
	羽田亨(1882—1955)	东洋史学
	小島祐马(1881—1966)	中国哲学史
战败前后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中国语学中国文学
	宫崎市定(1901—1995)	东洋史学

由此可知,“东洋学”的主体即是以中国文史哲为主的“中国学”和包括日本史在内的整个“东洋史学”,当然,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叉融合的。仅就其研究侧重点之不同而言,本文所指的“京都学派”,是指以狩野直喜为创始人的“中国学派”,其完整的表述应为“中国学京都学派”或“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学学派”。《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为了照顾到学科的平衡性,在各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代表者中仅列了“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的谱系,事实上,还有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在铃木虎雄之后、吉川幸次郎之前任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第二讲座教授(1938—1947)的青木正儿(1887—1964)和曾兼任东京、京都两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1939—1949)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

^① 资料来源:砺波护:《京大东洋学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据其书内容综合而成。

综上所述,可将各“京都学派”的概念关系图示如下:



京都学派的总阵地是京都帝国大学,作为其分支之一的中国学派阵地当然是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离开了文科大学,中国学派就无从谈起。“文科大学的开设,不仅是该分科大学自身的大事,也是京都帝国大学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①那么,文科大学究竟为何能在京大历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

始建于 1877 年的东京帝国大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逐渐呈现出作为当时唯一的帝国大学的垄断形势,因此,有识之士担心东大会因此沉醉于自我满足中,从而导致其衰退。他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设立第二所帝国大学,与东京帝国大学形成良性竞争,以便于日本的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能积极健康地发展。因此可以说,这第二所帝国大学就是带着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竞争对手的使命而设立的,它就是京都帝国大学。与东大建校之初大量聘请外国学者为教授不同,京大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中心形成教授集团。这些留学人员虽也出身于当时处于独霸地位的东京帝国大学,但从建校之日起,校长木下广次就明确倡导本校的个性与独立的校风,即京都帝国大学并非东京帝国大学之分校,而是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既是一所独立之大学,就须有固有之生存方式;为形成固有之生存方式,须有独特之资质。故京都帝国大学的母体虽为东京帝国大学,却产生了不

①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编:《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史》,京都:京都帝国大学出版部,1935 年,第 17—20 页。按,本文所引日文资料,除注明所据译本外,均出拙译。

同于东大,而且常常是与东大分庭抗礼的学风,为学术和研究的革新作出了贡献^①。因此,京大在学风、学制等各方面都尝试探索一条与东大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反拨与革新,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文科大学。

在京大分科大学的设立顺序中,文科大学被置于最后^②,毕竟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科的确是产生社会效益最慢、实用性最低的学科,甚至颇有一些与社会脱离的意味,然而日后能与东大抗衡、使京大闻名于世的,竟然正是这个文科大学。早在文科大学尚未开设之时,就曾有人预言:

活动的、世俗的东京与静止的、脱俗的西京,影响着东西两大学,东大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其特长,京大则倾向于培养学者型人才。将来京大在各分科大学设置齐全时,最放异彩的会是文科大学,东大以法科著称,而京大则将以文科名世。^③

事实证明了这个预言。京大的理、工、医等分科大学,在短期内无法与东大相提并论已成事实。两校在 1909 年的格局对比如下^④:

	东京帝国大学		京都帝国大学	
分科大学	学科数	讲座数	学科数	讲座数
文科	3	24	3	23
法科	4	37	2	30
理科	9	26	理科、工科合为理工科大学	
工科	10	32	8	33
医科	2	32	1	22
农科	5	33	—	—
合计	32	182	14	108

① 天野郁夫著、黄丹青等译:《大学的诞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3、386页。

② 京都帝国大学按照整体规模为东京帝国大学三分之二的设想和当时社会升学意向者多少的顺序,从理工科(1897年)开始,法科(1899年)、医科(1899年)、文科(1906年)逐步设立。

③ 斩马剑禅:《东西两京的大学:东京帝大与京都帝大》,东京:讲谈社,1988年,第15—16页。

④ 资料来源:《大学的诞生》,第272—273页,有改动。

此时,京大文科大学下属哲学科(1906年)、史学科(1907年)、文学科(1908年)三学科的设置刚刚完成,在京大总体实力远逊于东大的基本格局下,其文科大学就达到了与东大文科大学相当的实力。可以说,京大文科大学从开设之初就以比肩东大为目标,而文科大学这种在京大内部一枝独秀的格局在此后数年内继续得以保持。

到1915年,日本的帝国大学共有4所,其开设的分科大学数目为:东京帝国大学6个(文、法、理、医、工、农),京都帝国大学5个(文、法、理、医、工),东北帝国大学3个(理、医、农),九州帝国大学2个(医、工)。其中只有东京、京都两所开设文科大学。以下再就这两大学在1915年时的格局对比如下^①:

分科大学	东京帝国大学		京都帝国大学	
	学科数	讲座数	学科数	讲座数
文科	3	28	3	24
法科	4	41	2	35
理科	9	27	—	11
工科	10	34	5	26
医科	2	32	1	23
农科	5	33	—	—
合计	33	195	11	119

由此可知,从1909年到1915年的六七年间,两大学的总体情况变化不大,但东大发展仍快于京大,京大的学科总数未增反减,只有文科大学仍维持了与东大相抗衡的实力。因此,“京大能够与东大相抗衡的非学术研究莫属,而不在于培养以官僚为主的实用型人才的教育方面。事实上,京大此后将自己定位成以文科大学为中心的学问之府,以此来对

^① 资料来源:《大学的诞生》,第384页,有改动。

抗东大”^①。

而京大文科大学与东大文科大学相抗衡的招牌学科当然就是东洋学。从第一任学长狩野亨吉开始,京大文科大学就重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研究。狩野亨吉(1865—1942)为文科大学的发展不遗余力,勇于打破学历等硬性条件的束缚,破格聘用了只有秋田师范学校学历的内藤湖南等学者。近一个世纪以后,京大东洋学传人、《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的编者砺波护在总结这百年以来的历史时,不无自豪地说:

京大文科大学在创设之际,就为了创造有别于既存的东大文科大学的特色而颇费苦心。作为其特色之一,在文科大学的哲学科、史学科、文学科中分设同属于“中国学”的“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讲座。这三个讲座的设立,也是京大建校之初的方针之一。早在1892年10月,后来制定《京都帝国大学条例》的帝国博物馆馆长九鬼隆一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区教育家大集会上,就曾发表了在京都设立一所大学的构想,这所大学应不逊于欧洲诸大学,以参与世界文化为己任,此外,还应有一种特色,即扮演东洋学主盟者的角色。^②

京大东洋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回顾这段百年史,不能不注意到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和内藤湖南等人一起成为京大东洋学创始人的狩野直喜。

二、狩野直喜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的确立

近代学术转型时期的日本汉学家多不从事某一项专门领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往往横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狩野直喜即是一位通才

①《大学的诞生》,第270页。

②《京大东洋学百年·前言》。